

本土规划历史人物及其营城思想研究

崔 凯¹, 侯家贝¹, 邹宜彤²

(1.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建筑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55; 2.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中国城乡建设与文化遗产研究院, 陕西 西安 710055)

摘要: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本土规划营城思想, 但是目前学术界对营城思想背后的规划人物了解尚浅。对于规划历史人物的生活环境、性格特征与其营城思想的影响机制还较为模糊, 从历史人物的角度出发, 可以较为系统的梳理本土规划理论中营城思想的特征脉络, 通过对本土规划思想的人物脉络、规划特点、历史事迹及营城思想进行总结、梳理, 归纳出循吏、文人、匠师、堪舆师四类本土规划人物, 并对其营城思想进行总结, 对于理解本土规划人物的“多重身份”, 丰富本土城市规划理论体系和增强中华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 本土规划; 历史人物; 营城思想

中图分类号: TU398.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7930(2024)03-0418-08

A study of historical figures and their ideas about urban development in local planning

CUI Kai¹, HOU Jiabei¹, ZOU Yitong²

(1. School of Architecture, Xi'an Univ. of Arch. & Tech., Xi'an 710055, China;

2. China Academy of Urban-Rural Development & Cultural Heritage, Xi'an Univ. of Arch. & Tech., Xi'an 710055, China)

Abstract: In the long-standing history of Chinese culture, rich ideas about local plann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have been accumulated, but further academic research is still needed to learn about planners behind ideas about urban development. The living environment, character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camp city thought of historical figures in planning are still relatively vagu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figures, the characteristic vein of camp city thought in local planning theory can be systematically sorted out. This paper summarized and analyzed relations among historical figures, characteristics of planning, historical deeds and ideas about urban development in the thought of local planning, and classified local planners into respectable and morally lofty officials, literati, craftsmen, and geomancers, whose ideas about urban development were summed up. The results of this paper are of great value and significance to understanding the “multiple identities” of planners, enriching the system of local urban planning theories and enhancing confidence in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 local urban planning; historical figures; ideas about urban development

中国历代的城市营建与规划人物密不可分, 虽然无相关史料典籍对营城规划思想经验进行系统性的总结, 但是从历朝历代的城市规划实例来看却是前后统一、自成体系的。人是社会实践的主体, 道因人而显、因人而传, 优秀的经验和传统都是由人在学习、实践中而产生并传承。马克思认为: “人双重地存在着, 主观上作为他自身存在着, 客观上又存在于自己生存的这些自然无机条件之中。”^[1] 人作为客观主体存在于自然环境之中, 为了自身存续而不断改善周围环境, 而社会文明的进步又在人类的营建活动中不断向前发展, 二者相辅相成, 共同推进社会的前进。因此, 研究历史规划人物的活动及其事迹, 继而总结其经

验与思想, 便是应有之义。

1 规划人物的概念

规划, 虽为中国近世始出之词汇, 但就其内容而言古来早已有之, 在古代文献中, 古人习惯以“规画”来称呼。就规划概念来说, 它是人运用科学方法融合多要素进行的全面、系统、长远的发展计划。在具体实行的过程中, 往往也包含诸如设计、施工等内容。所谓规划师, 即与此活动有直接关系且有所贡献者。从中国本土的视角上来看, 规划师是指在城市、建筑、园林、水利工程等领域有规划营建事迹与思想作为者。

收稿日期: 2023-12-25

修回日期: 2024-04-08

基金项目: 陕西省教育厅科学研究计划资助项目(21JK0202)

第一作者: 崔 凯(1985—), 男, 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城市建筑史。E-mail: 674611501@qq.com

长期以来,受现代学科分类影响,对人物的相关研究往往只限定在某一领域,如与城市规划、建筑学、风景园林等专业领域相关的人物,如果从现代视角来看现代人物,这一门类划分与专门研究自无异议。但在中国古代社会中,这种以具体专业领域区分人物专业身份的方法显然不够全面。通过具体考察来看,中国古代大多数人物的身份属性是多方面的,在人物活动历程中其职业身份也较为多变(少数有单方面或不变者),以现代单一视角来审视划分此类人物的专业属性都较为复杂,同样,进行抽丝剥茧式的单一领域研究显然也是片面的。本文以“规划人物”的称呼来限定研究对象符合中国传统,且能够全面地对人物事迹、经验与思想进行研究分析。在中国本土视野中,中国规划人物是指在城市、建筑、园林、水利工程等领域有规划营建事迹与思想作为者,其范围包含以上诸领域。

2 规划人物的发展脉络与分布特点

在城市文明成熟之前,就曾有商代盘庚迁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公刘迁豳“相其阴阳,观其流泉”^[2]。礼乐文明成熟后,本土规划设计首先从都城营造开始,持续了近两千年。最早由西周

周公旦“伋图献卜”规划经营洛邑,后春秋时期管仲“因天材、就地利”^[3]的立都之法对都城营建思想进行了创新。随后都城营建逐渐朝着大尺度、大规模发展,从李业兴“营构一兴,必宜中制”^[4]规划邳南城到宇文恺“思理通赡”^[5]构造两京,再到周世宗扩东京、北宋丁谓开渠修宫、元代刘秉忠营大都,中国本土都城营建理论逐渐走向成熟。由于古代都城的营建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规划理论和营城技艺,且很多相关历史人物皆是重大城市规划建设工程的直接领导者和主要参与者,因此都城及京畿地区的先进文化和技术极为活跃,中国古代规划人物集聚于此,在时空分布上具有系统性、传承性和随时代变化的特点(图1)。

自唐代开始,地方城市规划建设勃然兴起,与之相随的是大量地方规划人物的产生,这一现象到明清时期发展至顶峰,在现今所能见到的同时期地方志与遗存碑刻中,规划建设之能人遍布大江南北,这些规划事迹各自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点,而往往在小异中又有着大同。无论是从由远及近的时空纵轴,还是从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横轴,都城、地方城市的人物共同构成了详尽、完整的中国古代规划人物谱系(表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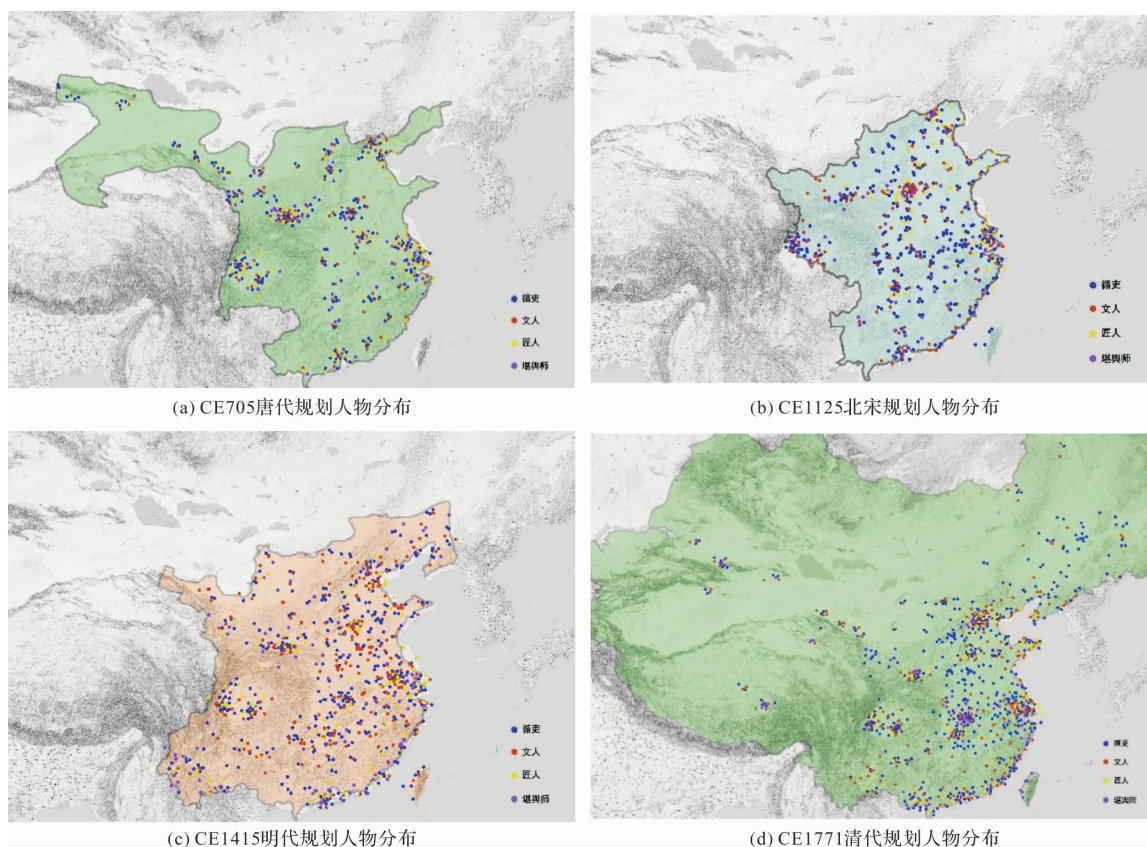


图1 规划人物分布时空演变

Fig.1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the distribution of planners

表 1 古代重要规划人物及其营城主张或事迹

Tab. 1 Important ancient planners and their opinions or deeds related to urban development.

类型	人物	朝代	规划营城思想	规划案例或代表作	出处
循吏	姬旦	西周	有据可考的最早的城市规划案例.	洛邑	《尚书》
	管子	春秋	生态营城理念, 倡导人与自然和谐.	《管子》	《管子》
	刘秉忠	元朝	仿照《周礼 考工记》, 熟读《易经》, 深谙风水之道.	元大都	《元史》
	王原觐	明代	主持迁建县城, 并将新县城规划工作划分为五部分.	祁阳城迁县	《祁阳县修城记》
	王钟鸣	清	营城乃“百年大计”, 既用营建弥补了现状之不足, 亦为后人留下治理补救之法, 便利后人.	治理庄浪城	《庄浪县志》
	姚汝章	明代	筑城以为民, 造郭以守民	鲁山县城	《鲁山县志》
	富斌	清	百姓的参与, 乡绅、邑人及官员共同铸就城市营建.	张掖县城	《甘州府志》
文人	白居易	唐代	致力于城市园林的营造, 体现文人意境.	履道坊宅园	《洛阳名园记》
	苏轼	北宋	梳理城市与山水关系, 构建城市大尺度山水格局, 疏通河道, 治理水系, 营造美好人居环境.	杭州西湖治理	《苏轼文集》
	范仲淹	北宋	注重美好人居环境的营建.	治理太湖	《安丰广容桥记》
匠人	宇文恺	隋	制作模型绘制图纸, 具有创造性和敏捷思维.	隋大兴城	《隋书》
	杨潜	唐代	吾善度材, 视栋宇之制, 高深圆方短长之宜, 吾指使而群工役焉. 舍我, 众莫能就一字.	官署等	《梓人传》
	阎立德	唐代	进行前期勘察设计, 因山为陵, 就近取材等.	翠微宫、玉华宫	《新唐书》
	喻皓	北宋	精通木结构营建和建筑受力情况.	《木经》	《梦溪笔谈·技艺》
	李诫	北宋	对营建规范进行了总结, 是古代城市营建技艺的集大成者.	《营造法式》	《营造法式》
	蒯祥	明代	师从其父, 精通尺度计算、几何原理, 榫卯技巧在建筑艺术上有独到之处.	北京明故宫, 天安门	《明会要》
堪輿师	杨雄	西汉	创造《图宅书》(图宅术), 使相宅相墓发生关联.	《图宅书》	《甘泉赋》
	郭璞	东晋	提出经典的“风水”理论, 有墓葬选址“藏风聚气”一说.	永嘉郡城规划、《葬经》	《晋书》、《葬经》
	庾季才	隋	观测天象、推演时令, 精于地理占卜.	隋大兴城迁都	《隋书》
	杨筠松	唐代	后代“形势派”和“江西派”鼻祖, 风水术数尚理气派的宗师.	《撼龙经》等 《四库全书》	
	周敦颐	宋	将宇宙生成论表述为: 无极—太极—阴阳—五行—万物, 阴阳二气化生五行, 五行生克制化构成世界万物. 是“气”理论的前身.	《太极图说》	《太极图说》
	朱熹	宋	对风水进行了理论的改造, 以孝道观为风水学说注入理学的伦理因子, 实现了风水的理学化.	孝道风水论	《朱子家礼》
	蔡元定	宋	将风水学说改造成理学道德教化的工具.	《发微论》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3 本土规划人物的类型

3.1 循吏

在中国历史中, 循吏是为正史所记、为世人所普遍称颂的好官. 古人认为为官要具备四德才能称为循吏, “曰廉、曰才、曰慈惠、曰强干, 四者尽之矣, 而史传不以四者名吏而标其目曰循, 循之为言良也, 舍四者无所谓良.”^[2] 循吏掌握着地方规划营建的主导权, 且人数最多、影响范围最广(图 2), 从最早鉴于《史记》、《汉书》到《清史稿》中间历代都有对于循吏参与地方规划的记载. 如西汉蜀郡守文翁与唐代澧州刺史李泌、北宋苏东坡、明代鲁山知

县姚汝章等, 作为主政一方的父母官, 惠及民生、改善城市环境、治理一方是他们的主要贡献.

中国历代循吏基本都是通过刻苦攻读诗书考取功名而走向仕途道路, 从小生活在儒家思想下的他们在规划营建时具有极强的自觉感与使命感, 如元皇庆二年(1313 年), 徐行逊为济阴县教谕, 到任之初, 看到儒学建筑群倾颓不堪, 当即与同僚说“公辈读圣人书, 食天子禄, 讼狱虽重, 学校尤先, 若不修葺, 必致废弛, 得不负累降诏命、兴举学校之旨意乎?”于是开始规划修葺之事. 初到一地为官, 循吏首先会对当地的地情民情、吏治风气、城市建设等状况进行初步了解, 通过对

城市的规划建设解决社会问题或营建利国利民的项目。据《武威县志》载:“何廷圭,字觐皇,浙江萧山人,康熙四十八年任(武威知县),矢志水清,率属风厉……经画有方,供应不匮,事集而民不病,捐貲市民田,修建行署、营房四千余间,免城中居民临时搬移。……民甚德之,入名宦。”^[4]

此外,循吏规划多具有舍私为公的品质,崇尚“不侵于官,不夺于民”的做法。嘉靖十五年

(1536年),林希元知任钦州,为了不给百姓造成负担,建凋敝且简陋的学宫于宏垵之地,并力求改善城市环境,对民众“教之版筑御火与湿,民未即从,令罚其尤不率者以益工”,使得城市环境大有改善。且在任期间多有善政,以城市主体和民众生活为重但对个人简朴节约的做法堪称循吏规划之典范。^[7]综上可知,循吏营城大公无私的品质为我国古代地方城市的规划营建作出了重要推动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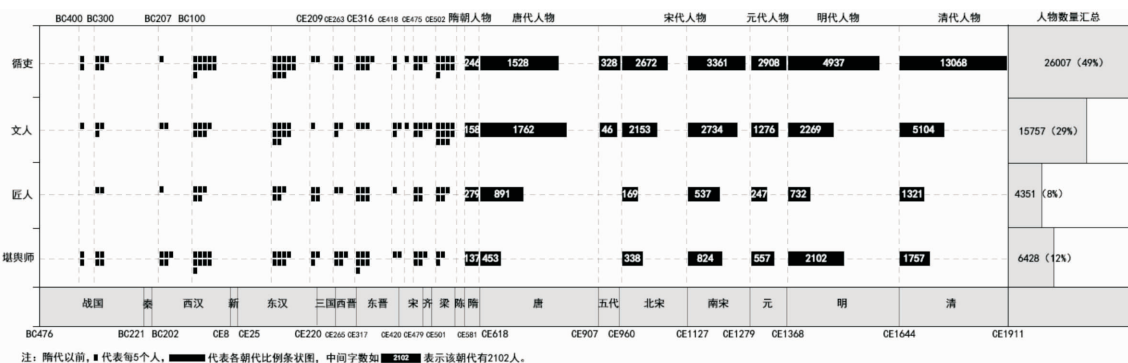


图2 历代规划人物数量统计

Fig. 2 Statistics about the number of planners in the past dynasties

3.2 文人

与西方规划思想立足于数理逻辑思维有所不同,我国传统规划思想更多的源于人文哲学在城市营建中的投射,文人营城往往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赋予城市人文审美与内涵。如苏轼利用其敏锐的洞察力,捕捉到“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的杭州城市意象,并借助文坛打造独特的城市名片。^[10]此外,由于古代文人还具有政治家、工程师等多重身份,决定了文人营城具备了独特的实用性、公共性与艺术性。苏轼在杭期间注重水利工程的治理,于杭州西湖疏淤引流,解决了城市用水和运河补水问题,同时改善提升了西湖的景观与生态环境。在艺术方面,他将对地方乡土的热爱和自己特有的修养与才情注入城市空间环境的营造之中,注重与自然和谐相融的城市营建观念。如《放鹤亭记》:“升高而望,得异境焉,作亭于其上。彭城之山,冈岭四合,隐然如大环,独缺其西一面,而山人之亭,适当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际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风雨晦明之间,俯仰百变。”^[8]放鹤亭的建造恰巧补足了空缺,使四周的山峦与亭台互借形成完整空间,达到和谐统一的效果。

除了大型城市规划项目外,文人更喜欢将自己的的人生观、价值观体现在城市园林的规划营建上(图3)。以唐代白居易在履道坊营建的宅园为例,选址位于洛阳城中一隅,体现了白居易“地与

尘相远,人将境共幽”^[9]的“中隐”思想。园中规划形式表现出崇尚自然、精于巧变,寓情于景,清幽雅致的风格。《池上篇并序》开篇有:“都城风土水木之胜在东南隅,东南之胜在履道里,里之胜西北隅。”^[9]白居易取势自然,凿池引水,结合水源构筑亭、台、楼、阁,使用借景手法营造富于变化的园林景色,曾有诗描述云:“西溪风声竹森森,南潭萍开水沉沉。丛翠万竿湘岸色,空碧一泊松江心。浦派萦回误远近,桥岛向背迷窥临。澄澜方丈若万顷,倒影咫尺如千寻”^[9]作为文人造园的集大成者,在细节上延续文人对比、反衬的创作手法,通过树与人、石与琴的巧妙结合展现出悠悠禅意,如《小阁闲坐》:“阁前竹萧萧,阁下水潺潺。拂簟卷帘坐,清风生其间。静闻新蝉鸣,远见飞鸟还。”表现出清幽雅致的规划意境,将文人心思细腻之感体现的淋漓尽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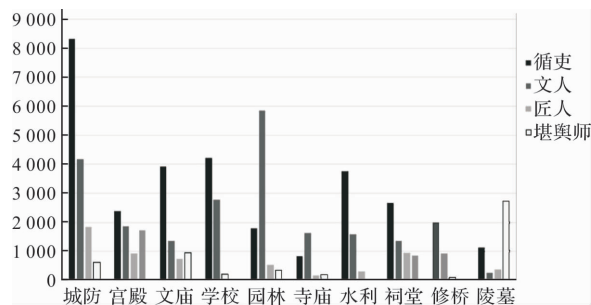


图3 规划人物活动类型

Fig. 3 Types of activities of planners

文人士大夫不仅是城市人文空间格局的设计者、实践者,还是维护者、传承者。他们以“守道”的精神与“弘道”的使命,捍卫城市的人文空间秩序,并以他们的社会威望影响社会各界共同参与这个秩序的守护,并代代相传,成为一方人心的共同价值,城市规划正是有了这个“共同价值”,才会在任何情况下,永葆中国城市的精神。

3.3 匠人

西汉时期,《考工记》被纳入《周礼》,记载了“匠人”“匠人营国”“匠人建国”等事迹。古代殿、堂、楼、阁、塔、榭、廊、亭等无一不是出自匠人之手,可谓无匠则不立(图4)。匠人的特点在于其对规划设计意图的准确理解以及对尺度数理的精准把控,据《隋书·宇文恺传》记载,宇文恺对隋大兴的规画包括以下几个阶段:(1)博览古今之制、融贯形成方案;(2)绘制图纸或制作模型;(3)上报实施。这就要求匠人既要熟悉典籍中的制度经典相当熟悉、融会贯通,又要具有形成方案并进行表达的技巧,唯有“学艺兼该”,兼有学识与技艺的大匠才能胜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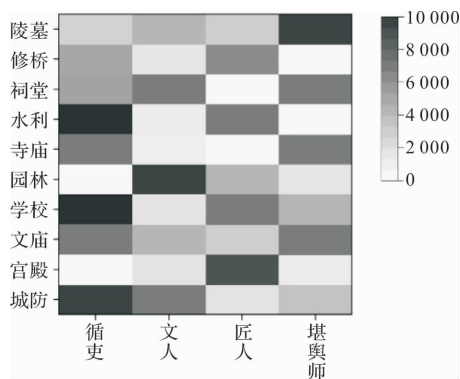


图4 规划人物与活动相关程度

Fig. 4 Correlation between planners and activities

明代杰出匠人蒯祥,自幼随父学艺,在木工和营造设计上颇有建树,主持了明初北京故宫的设计,是学界公认的天安门城楼设计者,曾被永乐皇帝赞誉为“蒯鲁班”,史载“凡宫殿庙社,皆所从事。”他精通尺度计算,每项工程施工前都作了精确的计算,竣工之后,位置、距离、大小尺寸、与设计图分毫不差,其几何原理掌握得相当好,榫卯技巧在建筑艺术上有独到之处。《明会要》载:“景泰七年,以工匠蒯祥、陆祥为工部侍郎。”蒯祥因有功于朝廷,从一名工匠逐步晋升,直至被封

为工部左侍郎,授二品官,享受一品官俸禄。由此可见,能堪当“大匠”的匠人必定“性绝巧,有智思,用意精微”,对空间有着极强的把控能力,才能为规划项目的落地保驾护航。

除名迹俱见于史书的大匠以外,大多地方工匠的名讳和事迹在历史文献中都未留下只言片语,但他们在各地遗留于今的精彩城市建筑作品却是古代地方城市规划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塑造着一方地域的特色文化。

3.4 堪舆师

“堪”指天,“舆”指地,所谓堪舆即通过对自然环境的勘察进行城市选址、道路规划以及建筑布局的理论学说。早期的堪舆师从《周礼》《易经》中获取天文、地理知识,到魏晋时已初具规模。东晋郭璞将阴阳理论运用于陵墓选址,其所著《葬书》成为历代堪舆师争相学习的经典之作。《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术数类》详称“相宅、相墓”者为堪舆师,《隋志》又曰形家。

隋大兴城的营建是古代堪舆师的重要实践,《隋书·庾季才传》关于迁都有这样一段论述:“臣仰观玄象,俯察图记,龟兆允袭,必有迁都。且尧都平阳,舜都冀土,是知帝王居止,世代不同。且汉营此城,经今将八百岁,水皆咸卤,不甚宜人。愿陛下协天人之心,为迁徙之计。”^[6]从庾季才的论述中不难看出,堪舆师通过包括天文、地理、卜筮等知识的运用进行城市选址规划。唐代山形水势进一步发展,唐国师杨筠松擅堪舆术,在地理堪舆学中享有崇高地位。《永乐大典》记载:“世传黄巢之乱,杨筠松窃秘府之书,避地江南,传其术者如厉伯邵、范越风辈是也。”^[11]杨筠松在赣南地区进行了大量的建筑风水实践,被后代江西“形势派”尊称为开山鼻祖。中唐时期,吉州长史杨卓同样通过对山水形势的选取,以获得舒适的心理感受,其“善阴阳悬艺,为时辈之先。至于辨别山川形胜,相识岗原气候,时所比量,未之有也。”

宋代之后,“堪舆”一词逐渐被“风水”替代,甚而直接称堪舆师为地理家。一代大儒朱熹精通易学堪舆,结合宋代浓厚的理学和宗族观念背景,将堪舆学说引向理和气。南宋赵彦卫对宋代堪舆师进行了分类:“今地理家则有‘大五行’之说……

近年又多用郭璞《锦囊》，先看山从何来……又有用古《青囊》者……”^[13]逐步形成了以江西的形势派与福建的理气派为主流的堪舆师流派。元代至明代初年，堪舆师参与城市规划、为发展建设提供“专业意见”的情况已较为普遍(图5)。如刘秉忠在元大都规划中将大都北面仅开两门以“藏风聚气”。明代末期之后，大规模的城市建设趋于稳定，堪舆师将主要精力聚集于民间，甚至发展出针对衙署选址、文武庙布局、文塔择向等的专门理论。如明崇祯末年(1644年)新田县曾采纳形家言“前有天马，后有翠屏，居高临下，诚莫善于此”而确定了县署选址^[11]；清道光四年(1824年)淡水厅由形家帮助选址规划文庙，“凡大小之规模、坐向之方位，皆其指画”^[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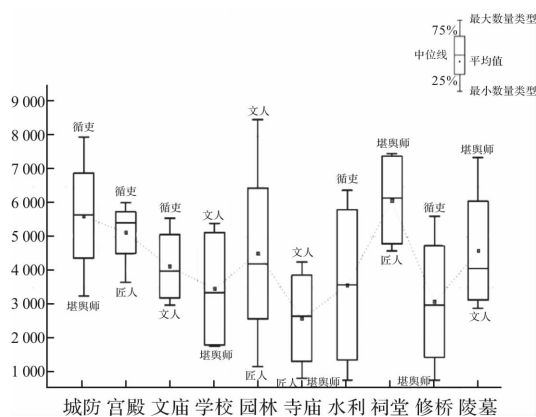


图5 规划活动频次统计

Fig. 5 Planning activity frequency statistics

4 规划人物的营城思想总结

4.1 文匠结合，注重文化涵育

文人参与城市营建是中国本土规划活动特有之现象，士大夫的身份使得他们成为营城活动的主要领导者和推动者(图6)，往往更具创造力。由于具有深厚的文学功底，使得文人参与的营城活动具有独特的人文底蕴和审美内涵，甚至可以借助自身在文坛的影响使一座城、一处景脍炙人口、千古流芳。此外，文人成长于儒家思想下的人生经历也使得他们更能体会到人间疾苦，与百姓感同身受。“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强烈责任感使他们借助政府的权利而实现利国利民的工程营建，从这个角度上说，他们首先是文人，其次是政治家，还具有一定的工程素养。

然而，传统文人多有宏观而感性的思想，这与匠人精于具体技艺的特点互为补充，从中国后世城市规划的整体发展来看，特别是地方城市规划，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规划模式，即“文人+匠人”的营造模式。文人与匠人分工协作的模式可谓中国古代城市人居环境营造之特有现象，明代计成在《园冶》一书中对这种营建模式已有定论：“三分匠人、七分主人”，在项目建造的整体过程中，设计者可能提出的建议是主要的，大多精巧的设计灵感往往是具有丰厚文化修养的“主人”提出的，而能工巧匠则负责对主人提出的方案在工程中予以具体实现。在这种模式下，形成了我们特有的“文人谋划，匠人实施”规划班底模式，支撑了地方城市的规划和建设。丰富多彩的地方城市规划及其精妙绝伦的建筑空间布局，工程与人文、技术与艺术的有机融合，可谓是中国式城市营造的大智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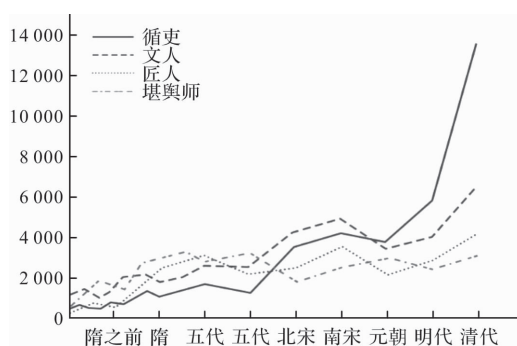


图6 规划人物数量增长趋势

Fig. 6 The rising tendency of the number of planners

4.2 因地制宜，结合山水环境

本土规划人物的营建实践注重城市与周边山水环境的利好关系，注重生态环境的智慧，如宇文恺兴建隋大兴城、苏轼修缮临安城、刘秉忠营建元大都等；在地方城市的营建中，往往因山脉、因地形而异，如陕西富平县老城借助高“塬”形成防御之势……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都城营建还是地方城市的建设，都在城市选址、空间格局以及地理、水文、气候等方面与自然环境有很好的契合，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从大尺度空间格局上看，古代规划人物通过将城市与附近山脉、水系建立联系，借助自然山水实现城市防卫及城市给排水的目的；

(2) 从中尺度格局上看，传统的规划设计通常

借助将远山、河流水系甚至亭丘纳入到规划体系,巧妙利用周边山水湖泊等自然环境与城市建立联系,构建了人与自然相和谐的人居环境;

(3) 在小尺度的规划设计上,本土规划营建通过对建筑朝向、建筑组团的轴线控制以及生态环境的营造实现对自然资源的巧妙利用,减轻城市对环境的负担。

这些成功的生态营建思想是古代规划人物长期观察自然、与自然环境长期相处的过程中获得的经验结果,体现了古人的生态智慧,通过巧妙利用自然资源,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

4.3 上下协商,民众广泛参与

中国本土的城市营造向来是开放的,数千年来,对美好人居环境的向往一直是“官”与“民”的奋斗目标,为官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入世情怀,无不是建立在“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愿景之下。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富斌出任张掖知县,通过“以工代赈”等方式修缮城垣、改善城市环境,解决了历史遗留“花费数倍于他所”的问题。在工程完工后,主事富斌并未将功劳归结到自己身上,而认为是集体努力的结果,城碑记云:“是岂馨鼓之验欤?良由皇仁之普遍,民力之奋兴及二三绅士同心协力,遂相与以有成,余又何敢矜言况瘁哉?”^[14]清康熙初年杨懋绪修缮潼关,先与上级督台、抚台、两台、藩宪、臬宪商议,得到一致赞同后,又带头捐助工程款,得到同僚及民众的一致响应。最终“不数月而河工毕,乃告厥成”。至此“官”与“民”不再是两相对立的阶级,而是角色不同、分工不同的合作伙伴,官方与公众群策群力,体现了规划营城中一人主导、众人协商、集体参与的民主规划意识。

4.4 传承有道,前后赓续不断

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规划人物分为官方、民间和士人三类^[15],而这三类规划人物又分别体现了家族承续、经验承续和文脉承续的思想观念。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由政府主导,但在具体规划中所用匠师也有不少家族文化传承的案例,据大唐故朝议郎行左校署令上柱国刘府君墓志铭载:“君讳行师,字派族,彭城人也……君朝议郎,行左校署令……长子承泰,右校监作,第三子元惠,

直将作监……”,刘行师长子与第三子均在将作监工作,长子刘承泰为从九品的右校监作,第三子刘元惠为直将作,地位更低。这为官式营造的家族传承提供很好的实例印证。民间规划人物通常包括堪舆师和民间工匠,前者主要参与选址、择向及山水格局的营建工作,后者承担营建中的具体工程问题。两者都是通过长期的实践,以师徒、父子等口耳相传的形式实现经验的承续。文人身处官方和民间之间,在具体营城过程中更追求规划建设之长远。如明代时河南郑县城池的修建自隆庆三年(1569年)始,历经三任知县的主持,历时十载而协力完成;山西太谷县清代县令吕崇谧创建凤山书院,规模初具而离任,继任者高继允继续建设,以追求文脉的延续等。

5 结语

知人物则百业兴,对过往人物之辨析总结不仅在于历史学术之研究,更重要的是关乎文明之传承与进步。在本土规划人物的身上,可以看到大量闪耀着光辉足为后世垂范的规划经验。从各个规划人物的具体思想出发,可以寻找其时代共性与价值共性,而对中国古代规划人物思想进行全面凝练、总结,可以得到其思想产生动因、演进变化规律与不同时代规划思想的共性所在。诚然,历史人物是具体的,不是完美无缺的,在几千年的发展进程中也存在着迷信风水、滥用民力、思想片面等弊端。但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也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以人物规划思想精髓为着手点进行梳理总结,继而资鉴应用于当今之城市规划建设,这才是中国本土规划历史人物研究之真义所在。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0.
MARX K, ENGELS F. The Complete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Vol. 35 [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6,10.

- [2] 崔凯,王树声,严少飞. 中国古代循吏营城事迹及建设思想举要[J]. 建筑与文化,2016(10):82-83.
CUI Kai, WANG Shusheng, YAN Shaofei. The deeds and construction thoughts of the ancient Chinese city following officials [J]. Architecture and Culture, 2016 (10):82-83.
- [3] 管仲. 管子[M]. 北京:中华书局,2016. 01.
GUAN Zhong. Guanzi[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2016. 01.
- [4] 张珩美,曾钧,苏瞰. 武威县志[M]. 武威:武威县志编纂委员会,1982.
ZHANG Shaomei, ZENG Yun, SU Jing. Wuwei County Annals [M]. Wuwei:Wuwei County Annals Compilation Committee, 1982.
- [5] 魏收.《魏书》卷八十四,列传第七十二,李业兴传[M]. 北京:中华书局,2018. 08.
WEI Shou. Book of Wei, Vol. 84, Biography 72, Li Yexing Biography[M]. Beijing:Zhonghua Book Company,2018. 08.
- [6] 魏征. 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3. 08.
WEI Zheng. The Book of Sui[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1973. 08.
- [7] 朱轼.《历代循吏传》卷首,序[M]. 苏州:江苏书局,1730.
ZHU Shi. Preface to the Chronicles of Successive Officials [M]. Suzhou: Jiangsu Book Company, 1730.
- [8] 伦以训. 修钦州堂记 [M]. 高州:登云楼,1834.
LUN Yixun. Records of Repairing Qinzhou Tang[M]. Gaozhou: Dengyunlou, 1834.
- [9] 苏轼. 孔凡礼.《苏轼文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SU Shi, KONG Fanli. Su Shi's Collected Works[M]. Beijing: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6.
- [10] 白居易. 白居易集(全四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79.
Bai Juyi. Bai Juyi Collection (All four volumes)[M], Beijing:Zhonghua Book Company,1979.
- [11] 江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江西古代名人[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 04:48-49.
Compiled by Local Chronicles Compilation Committee of Jiangxi Province. Ancient Celebrities in Jiangxi [M]. Wuhan: Wuhan University Press, 2018. 04: 48-49
- [12] 黄应培,乐明绍. (嘉庆)新田县志[M]. 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120.
HUANG Yingpei, LE Mingshao. (Jiaqing) Records of Xintian County [M]. Taipei: Chengwen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1975:120.
- [13] 吴性诚. 捐建淡水学文庙碑记[M]//郑用锡. (道光)淡水厅志稿. 台北:远流出版社,2006:206-208.
WU Xingcheng. Monument of Donation to the Tamsui Confucian Temple [M]// ZHENG Yongxi. (Daoguang) Tamsui Hall. Taipei: Far Current Press, 2006:206-208.
- [14] 赵彦卫.《云麓漫钞》[M]. 北京:中华书局,1996: 59-60.
ZHAO Yanwei. "Cloud Foot Flowing Banknote",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6: 59-60.
- [15] 孙诗萌. 浅论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三个传统”[J]. 城市规划,2021,45(1):20-29.
SUN Shimeng.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Three traditions" of ancient Chinese city planning [J]. City Planning Review,2021,45(1):20-29.
- [16] 严少飞,王树声,韩卫然. 宇文恺对隋代运河开凿的贡献研究[J]. 中国名城,2022,36(10): 83-89.
YAN Shaofei, WANG Shusheng, HAN Weiran. Yu Wenkai's contribution to canal construction in Sui Dynasty [J]. Famous City of China, 2022, 36 (10): 83-89.
- [17] 孙全胜. 城市空间规划与生态正义研究 [J]. 中国名城,2023,37(9):3-9.
SUN Quansheng. Research on urban spatial planning and ecological justice [J]. Famous City of China, 2023,37(9):3-9.

(编辑 桂智刚)